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六編 20

# 康熙時期 臺灣宦遊詩之詮釋研究

吳毓琪·著



#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刊

六 編

第 20 冊

康熙時期臺灣官遊詩之詮釋研究

吳毓琪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之詮釋研究／吳毓琪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目 4+254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六編；第 20 冊)

ISBN 978-986-322-963-6 (精裝)

1.臺灣詩 2.詩評

733.08

103015095

ISBN-978-986-322-963-6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六 編 第二十冊

ISBN：978-986-322-963-6

---

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之詮釋研究

作 者 吳毓琪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mailto: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9 月

定 價 六編 21 冊 (精裝) 新台幣 4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之詮釋研究

吳毓琪 著

## 作者簡介

吳毓琪，成功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現任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助理教授。研究專長臺灣古典文學、詩歌文化詮釋研究等。近期著作：《臺灣文學史長編 2：離散與落地生根——明鄭時期臺灣漢文學的發展面貌》、〈傳媒時代的臺灣古典詩壇：日治時期「全臺詩社聯吟大會」的社群文化與文學傳播〉、〈比較南社與瀛社面對新、舊文化交鋒的抉擇與取向——兼論謝雪漁對自我認同鏡像的建構〉、〈臺灣文學與文獻中「打狗」港灣符號的衍異與層構（1624～1920）〉等。

## 提 要

本論文以「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之詮釋研究」為題，藉由詮釋文本的研究路徑，同步徵引現代文化理論或文藝觀點，挖掘文本內部的深義，進而梳理出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潛在的研究議題。

第二章討論治臺之初的時代背景，臺灣在中國東南海域上的戰略地位，有助於朝廷解決海靖問題。來臺仕宦官員多被賦予巡視海上治安的特殊任務，而這項任務也常成為他們書寫詩歌的材料來源，換言之，宦遊詩作常與作者自身肩負的公務責任、職務範圍密切相關。筆者先以此章了解當時官員們面對臺灣的特殊情境，與實際投入的政治工作為何，進而探究康熙時宦遊詩的施政題材來源及書寫情況。

第三章以詩作闡釋來臺官員的政治實踐與情感體驗。康熙皇帝的朱子學教化觀給臺灣人民的同時，亦致力於興建學校及標榜道德人物，藉此實際行動來推廣教化觀。官員巡視農民遇早的災情，也透過祈天降雨，以示他們實踐敦農牧民的心志。無論教化詩作、早象祈雨詩作，皆採取「實用主義」的觀點來表現他們的宦政作為。除了上述仕宦「言志」的部分外，本章第三節討論了宦臺者歸鄉情感的表現，這類詩作中較易顯出作者「真我」的部分，也屬於仕宦者主觀情感體驗的展現。

第四章主要從符號形構的角度研究康熙宦遊詩人的風土詩作。基於考察臺灣經濟效用的目的，仕宦者多致力於闡釋物產的經濟價值。同時，筆者發現宦遊詩人會將物產從實用面向提昇到抽象意義層，將臺灣的土風俗物借由詠物詩書寫的方式，藉由譬喻、比擬等修辭技巧的運用，使物產的形象含具審美特徵。臺灣原住民生活符號的編製，仕宦者書寫風土詩作，一方面描摹原住民生活文化的形象特徵，再方面將作者的觀念意識含蘊於符號形象之中，使這類符號足具原住民審美文化及族群精神的再現效用。

第五章探討宦遊詩人的臺灣山水詩之空間擬寫，是以空間為論述主軸，鋪述宦遊者心中的臺灣山水。第一節首先闡析宦遊詩作所呈顯的渡海動態體驗與感受，宦臺者親見目睹「黑水溝」不同海層地形之光澤變化，將此地理空間所形成的視覺感受，扣住作者宦遊臺灣的主觀情思。第二節則是宦臺者實際進入臺灣島上觀察高山地形的體驗，作者將高山與平地景致的各種變化，透過視覺觀察轉入詩作裡，表現海島特殊的空間形態。當宦臺者為巡視地方民情的同時，行走在起伏變化的地形上，感受著臺灣島多山的地理形態，觀覽南臺灣副熱帶樹林，與田間綠野輝映成趣的景致，體會自然山色之美。第三、四節，主要探討康熙時仕宦者來臺引進八景詩的書寫體式，及其編組「臺灣八景」的過程。王善宗、齊體物及高拱乾三人的作品樹立「臺灣八景詩」的基本範式，因此，闡釋他們的作品，可見到作家本身的個性相當鮮明，三人皆各自表現對空間選取視角的觀點，融入的作品內容及書寫手法，亦各有特色。在此之後，來臺的宦遊詩人所書寫「臺灣八景」的內容，多將臺灣海洋特性與康熙帝王豐功偉業結合思考，並以海島一隅的空間特性來表達自己宦遊臺灣，孤處海角的落寞感，以二觀點共同形成這階段「臺灣八景」的思想意涵。



# 目

# 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方法	1
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1
二、研究方法	5
第二節 研究範疇與概念界說	8
一、研究範疇	8
二、「臺灣宦遊詩」的概念界說	10
第三節 文獻檢討	12
第四節 章節安排說明	17
第二章 康熙朝廷對臺灣的認知與仕宦者的角色 扮演	21
第一節 康熙統治初期的行政區域與臺灣社會	22
一、清領初期地方行政區的建置	22
二、康熙領臺時期漢番雜居的社會特徵	23
(一) 渾沌未化的臺灣番民	24
(二) 移入臺灣的漢人	27
第二節 康熙朝廷對臺認知與治臺政策	29
一、康熙朝廷對臺灣周邊海域的治理之道	29
(一) 面對絕域海疆的初步認知	29
(二) 靖海問題與臺灣的戰略性地位	32
二、臺灣社會的治安政策	36
(一) 理漢政策	36
(二) 治番政策	38
三、十七世紀臺灣於東亞的經濟效益與貿易 地位	41
第三節 仕宦者視域形成的背景因素	44
一、康熙皇帝對來臺仕宦者的角色期待	44
二、康熙時期在臺文武官員的職責	49
三、首任仕宦者的治臺經驗與施政重點	51
第三章 仕宦詩歌中政治實踐與情感體驗的展現	59
第一節 設立禮法文治社會的思惟	61
一、康熙朝廷倡導儒學教化觀的方式	61
(一) 尊儒術以作為政教綱領	62
(二) 敷文教以化育社會風氣	65
二、崇尚儒學教化的施政焦點	67

(一) 營造文教空間與臺灣「士」階層的初步形成	68
(二) 標舉倫理典範以形塑社會風氣	72
第二節 仕宦者在臺表現的敦農意識	80
一、宦臺者敦農時顯現的官民關係	81
二、仕宦者對臺灣旱象發生的觀察與應變模式	86
(一) 旱象發生之觀感與刻畫	86
(二) 爲民祈雨的漢人農政傳統	90
第三節 仕宦者遊歷臺灣的情志體驗	95
一、委派臺灣的情志反應	96
二、宦臺期間的矛盾心境	101
三、仕宦旅途中情感藩籬與家的呼喚	106
第四章 異域風土詩作的符號形構與審美意識	113
第一節 異域風土物產符號的採編認知與審美提昇	114
一、考量臺灣氣候與貢輸效益所編綴的物產符號	116
二、康熙宦遊詩人書寫臺灣物產符號的特色	118
(一) 草木花果之形象與生命情思的結合	118
(二) 實證辨析花果符號的形象特徵	122
第二節 番民生活文化符號的書寫	124
一、番民裝飾符號及其所反映的文化審美觀	124
(一) 將衣飾符號視爲經濟薄弱的表徵	125
(二) 將番民的身體文飾符號視爲變化象徵	128
(三) 對裝飾物符號的模糊認知	135
二、番民歌舞形象符號	141
(一) 與自然情性相映的即興式歌唱	142
(二) 族群歌舞具有的儀式象徵意涵	144
三、番民住屋文化符號的象徵意義	149
(一) 番社通衢牖戶的空間寓意	149
(二) 茅草屋頂的屬性象徵	152
第三節 康熙仕宦者形構臺灣風土符號的審美意識	155
一、清治初期臺灣風土文化符號的形構方式	155

(一) 方志中的符號建構	156
(二) 「風土志」與「風土詩」符號書寫的 差異	161
(三) 風土詩人對符號的選擇	162
二、宦臺者面對風土符號的態度與觀念	165
(一) 以漢文明價值對物產符號的涵化	165
(二) 文明與非文明之間的符號建構觀	166
第五章 宦臺山水詩的空間擬寫與內蘊意義	169
第一節 臺灣海洋空間的審美感知	171
一、橫渡黑水溝的感官覺受與喻意	171
二、遊觀日映海洋的空間向度	178
第二節 高山島的空間形象觸發審美感知	183
一、行走「山」感知空間地形	183
二、遠望「高山」的距離美感	187
第三節 「臺灣八景」詩作的空間呈現	192
一、「八景詩」源由與「臺灣八景」題材	192
(一) 「臺灣八景詩」之源由	192
(二) 「臺灣八景」的題材屬性	194
二、康熙「臺灣八景」的地理實存與文學虛構	195
三、「臺灣八景」首創者之視覺空間感	201
(一) 定點遠視所形成的空間觀	202
(二) 相對視角形成「我在」之空間感	207
(三) 多重視角與空間形象的比擬	212
第四節 山水八景詩與宦臺生涯共詠	218
一、以廣遠疆域空間形現朝廷豐偉功業	219
二、以海天邊疆之境反思「我」的存在位置	224
第六章 結 論	231
主要參考書目	245

# 第一章 緒 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方法

本章逐次說明論文研究動機、方法及論題範疇，並界定「臺灣宦遊詩」的概念，同時檢視前人的研究成果，並說明各章節安排之緣由。

### 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臺灣古典文學的源頭，往往上溯至明鄭沈光文，依據連雅堂《雅言》的說法，沈光文是因遭颶風飄遊來臺，此後在臺居住三十多年沈光文，歷經荷蘭、明鄭政權，目擊其事，著書頗多，被推為海東文獻的初祖。沈光文流寓臺灣期間，結合韓又琦、趙行可、沈朝聘及季麒光等人，於清廷領臺時，共「東吟社」，世稱〈福臺新詠〉〔註1〕。此為臺灣古典文學發展之起源說。

此起源往下開展的局面為何？往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是否受其影響？在連雅堂《雅言》裡僅簡單敘述沈光與「東吟社」的關係，倒是清人領臺後蓬勃發展的書寫現象，較詳盡地記述：

清人得臺，斯庵亦老矣，猶出而與宛陵韓又琦、無錫趙行可等結「東吟社」，所稱「福臺新詠」者也。當是時，臺灣令沈朝聘、諸羅令季麒光均能詩，……荒裔山川，遂多潤色。游宦寓公先後繼起，若孫元衡之「赤崁集」、陳夢林之「遊臺詩」、范咸之「婆娑洋集」、張湄之「瀛壖百詠」，蜚聲藝苑，傳布海隅。而臺人士之

〔註1〕 連雅堂，《雅言》，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1963年版，頁38。

能者，若黃侗之「草廬詩草」、陳輝之「旭初詩集」、章甫之「半嵩集」、林占梅之「潛琴餘草」、陳肇興之「陶村詩稿」、鄭用錫之「北郭園集」，或存或不存、或傳或不傳，非其詩有巧拙，而後人之賢、不肖也。夫清代以科舉取士，士之讀詩書而掇功名者，大都浸淫於制藝試帖……〔註2〕

在這裡連雅堂並沒有直接說「東吟社」對後人文學書寫的影響，僅說臺灣古典文學肇端詩社「東吟社」，有清初季麒光等人以臺灣山川為題的書寫，但是真正在臺灣形成一股書寫風氣的是，自清領臺灣的宦遊人士及本土人士有意識地寫作，如孫元衡《赤崁集》、陳夢林《遊臺詩》、范咸《婆娑洋集》、張湄《瀛壖百詠》，黃侗《草廬詩草》、陳輝《旭初詩集》、章甫《半嵩集》、林占梅《潛琴餘草》、陳肇興《陶村詩稿》、鄭用錫《北郭園集》等，於此，吾人可以看到清廷治理臺灣之初，臺灣文壇上開始出現中原來臺人士與本土文人交錯發展的局面，彼此之間共同形成推動臺灣古典文學勢力，書寫群的複雜化，加上清領之初科舉制度建立了文士「浸淫於制藝試帖」的風氣，產生臺灣古典文學發展的能動力。也因此，筆者認為康熙治臺後一連串的人員引進及制度建立，可說是古典文學發展的一個明顯開端，這開端的內容樣貌為何？往下如何傳承沿革以形成臺灣古典文學發展史，其最初的基源特徵為何？是否在明鄭古典文學所反應的民族感懷、流亡之思的作品之外，衍生出其他層面的文學書寫問題？

循此想法，筆者尋求開展詩歌研究論題的多元性，將研究對象鎖定於康熙時期宦遊詩的書寫群〔註3〕，主要因為臺灣文學史上大量出現書寫群是肇始自此時期，同時宦遊詩人主導當時臺灣詩文壇的地位，究竟臺灣古典詩書寫最初的樣貌為何？以此論題作為研究對象應該有其適切性。一方面可探究臺灣古典詩歌發展的基源問題〔註4〕，再方面是期望以詩作為主軸，分類來探究

〔註2〕 連雅堂，《雅言》，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1963年版，頁39。

〔註3〕 施懿琳，《清代臺灣詩所反映的漢人社會》中「清代臺灣詩作者資料表」，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論文，1991年版，頁71~81。

〔註4〕 「基源問題」此術語，在此筆者沿用勞思光的定義是以邏輯意義的理論還原為始點，而以史學考證工作為助力，以統攝個別哲學活動於一定設準之下為歸宿。筆者部分攝取此觀點，然有所不同的是，筆者認為古典文學發之最初應有內部的基礎模式，包含所謂初始作品中有何的文學現象、觀念意識及取材手法等，這些古典文學內緣發展的最初樣貌，在往後的文學發展史上，有何承接？有何轉變？皆需透過文學作品原始面向的釐清而後對

文本自身各種可能存在的論題，進而確立這時期臺灣古典詩的書寫取向。特別是透過文本的闡發，臺灣的山川、風土、民俗經由康熙宦遊詩人的情采藻飾後，躍現於今日讀者眼前又是何種不同的樣貌？這當中文本與世界之間形成什麼樣的相互關係？

目前臺灣宦遊詩的研究中頗多對「番」〔註5〕文化的論述者，歷來論者多援引殖民理論來詳加辯證，如莊雅仲、陳龍廷……這些論作多有可參證之處。唯筆者稍感興趣的是，回歸到文本本身，臺灣宦遊詩研究是否可擴及其他論域？在奠基於前人研究的成果基礎之上，是否仍有些論點仍可再進一步詳述？有些詩作透過精密地詮釋後，是否可將臺灣古典文學的傳承與流變，藉由康熙臺灣宦遊詩的探討，將不同作者、不同作品作比較性的論述，以窺見詩歌書寫模式最初是以什麼樣貌存在的？而後隨著王朝推移再作更進一步的探討，究竟哪些書寫模式歷經時間篩選、澱積後，被後人沿用？又有哪些被後人以新的書模式所替換？為釐清這些問題，筆者試著將詩作研究限定在某一時間範圍，精細地探究個中書寫的相同與差異處，能仔細說出個中緣由，才得以與其他階段的作品產生辯證關係。以本文所寫宦遊詩之教化主題為例，這類主題必定與朝廷政策習習相關，但因清廷始終企望臺灣社會能轉型成為文治化社會，究竟這項策略在領臺之初是如何被宦遊文人被認知而推行落實於臺灣？以形成他們共同書寫的主題及書寫策略。就筆者撰寫論文的過程所了解，仕宦者除了須委派來臺設立儒學教育機構，以教導學童讀四書五經之外，他們亦需將儒學向大眾來推廣，使地方百姓趨向儒學教化的價值體系。為此，當筆者觀察看到清初宦臺官員有大量題詠「鄭氏節婦詩」的現象時，便試圖透過清廷統治中原的文化政策來了解，仕宦者曾在臺灣社會裡標舉哪些教化典型，以形塑鄉里百姓共同價值趨向？這是筆者擬於本論文探索的第一個議題。

此外，詩歌體裁承載的內容，有其他文體不易取代的特殊性，除了作為「記錄」考察民情風土之用外，詩歌所含具抒情的成份更為濃厚。詩可以言志、詩亦可緣情，當仕宦者來臺灣後，面對一個從未真切了解的新政治版域，

---

照比較，才得以具體而清楚地指陳。勞思光《中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出版，1984年版。

〔註5〕本論文採用「番」字係因清代中原人對邊陲民族的觀念，絕非有心懷輕視之想，只為保留當時文獻原樣而沿用之。

所投入的精力不單是仕宦政治的事務面，亦需調整自己與陌生之地的情感關係，若從仕宦者對臺灣的情感認同來發出問題，吾人可以探討康熙宦臺者孤處海域的落寞心情與士不遇的感懷，這些情懷如何緊扣在他們的詩作中？又如何影響他們與臺灣這塊地方的情感生成或情感閉鎖？進而形成抽象的「我在」思惟？

又，人類所具有的符號創造本能，在最初仕宦來臺者的眼中如何被運用？同上述，宦遊詩處理原住民文化題材時，亦多具有采風紀實的動機，以作為朝廷考察了解地方之用，共同地將臺灣各類物產民俗作標記及分類，進而產生實用性的符號，供後來者辨識、了解與認知臺灣之用。如此，在前人眾多研究中，看見「番民」符號被帝國之眼給醜化了，他們所記錄的文化符號有所偏差，帶著強者輕視弱者的姿態來審視臺灣原住民；筆者所欲了解的是，哪些是仕宦者偏差觀念之下所形成的文化符號，又有哪些不然？有些番民文化的起源本身是有意識地學習飛禽走獸的，乃因他們與大自然維持平等關係，有時獸類形象反是他們所崇拜的，這是原始藝術的現象，若此仕宦者可能用盡奇異的詞彙將此文化現象如地紀錄下來時，康熙時期的宦遊者所寫的風土詩，便不一定要完全以所謂的帝國之眼籠罩臺灣「番」文化來詮釋之。為此，筆者想援引符號學探討人類文明意識的理論觀點切入風土詩作，期能了解宦遊者在形構文化符號時，如何地保留番民文化的原始特徵？又如何加入他們主觀的價值判斷來審視番民文化？

當中國首批官員渡海來到臺灣，奇山異水形成他們新奇的旅遊經驗印記時，哪些是他們最常選擇的視域圖像？而，這些地理圖像被宦臺者以什麼樣的審美距離與角度來審視之？這些審視的態度含著什麼樣的意蘊內容？他們宦遊新闢疆野之心情，是否藉著書寫寄寓旅臺感懷？中國詩歌經常論及「情」、「景」的關係，在他們的詩作裡如何被運用，並且針對不同於中國大陸的臺灣地形，擇取什麼特殊的題材來加以書寫呢？

針對上述諸多問題，筆者將分別於各章節中分別論述之。由於筆者以主題分類的方式切入探討，因此，每一章研究方法的操作會略有區別，主要是針對每一章的研究脈絡擇取合宜的文學理論觀點來論述印證，期能借此突出不同詩作主題的特性。

## 二、研究方法

本論文以詮釋文本作為主要研究路徑，係因筆者以「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之詮釋研究」為題，是以探討文學基源問題作為論述出發點，遂採用「小題大作」方式，以臺灣古典詩中康熙朝的宦遊詩為研究對象，企望將論述重點擺在文本深度開挖的工作上，從文學作品本身著手研究，尋找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潛在的研究議題。

筆者嘗試藉由第一手「文本」的閱讀，釐析出異於過去研究者所關注的文學視角。臺灣文學可以有多面性、開放性的閱讀，當這些文本再次地被闡釋、被開發時，文學不僅可以是社會歷史的註腳，它也可能越過此範圍之外，展現其獨有的風格面貌。

若擇取階段性的文本來作詮釋性的探討，則詮釋詩作後會出現一個的現象，相同生活情境下所產生的文學作品，會表現多元性的思想觀念及書寫現象，如此，筆者認為選擇詮釋的觀點，應不是單一種觀點來含括所有的概念，乃是依照作品思想及書寫特徵來選擇合宜的理論觀點，作為支撐詮釋論述的依據，進而期待借著作品的闡釋研究得以衍生出具論證性的文學結論，而這也是筆者在本論文嘗試著手「文學詮釋學」研究路徑的方式。

其中筆者操作方法，一方面留意伽達瑪「詮釋學」所著重的詮釋詩作時的歷史情境，亦即筆者閱讀詩作時便與康熙時期的歷史情境對話，在伽達瑪的觀念裡，文學是一種精神性的保持和流傳的功能，並且把它的隱匿的歷史帶進每一個現時之中，「古典作品」中複製與保持了一種富有生氣的文化傳統，這種傳統不只是保存現存的東西，並將它作為範例流傳下來。雖然文學藝術作品不可說是歷史意識的全部，但也包含了歷史的中介，為此「詮釋」文本的任務則是將作品的意義再造與組合〔註6〕；在「詮釋」文本時的理解過程中所發生的「視域交融」〔註7〕，正是筆者企望以現當代文藝理論詮釋古典

〔註6〕 漢斯-格奧爾格·伽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臺北：時報文化出版，1993年版，頁228~233。

〔註7〕 「視域融合」(Horizontverschmelzung) 伽達默爾對理解文本作定義所提出的一項重要概念，它認為理解文本不是一種完全試圖重構文本原義的「歷史的理解」，理解文本本身是在重新喚起文本意義的過程中，解釋者自己的視域具有決定性作用，像是參與遊戲或進行遊戲的提出意見或可能性，並以此幫助我們真正佔有文本所說的内容。《真理與方法：哲學詮釋學的基本特徵》，臺北：時報文化出版，1993年版，頁499。

詩作，進而開展古典文學研究多元呈現的目的，如同筆者前述會藉由不同學科知識的串連、運用來探掘臺灣古典詩歌的豐富意蘊。為此內文中筆者會因應各章節所需參酌援引不同的研究理論觀念，如主題學、符號學、詮釋學、詩歌美學、藝術人類學……以證成詩作深蘊的內容意義，並透過文本與文學觀點之間的相互印證，呈顯康熙宦遊詩的文學藝術特徵。筆者期待藉由本論文研究的基礎之上，未來再拓展對臺灣古典文學研究的新議題，進而具體而客觀地建構臺灣古典文學詮釋學的論述脈絡。

本論文在處理詩作時，主要是採用主題分類批評方式，細膩剖析詩作。主題類型研究的優點乃是它能夠釐清每一種類型文學作品的獨特性，把考察文學的注意力集中在某一類型內，尋找該類作品的共通性，也就是說它們所運用的文學技巧、所傳達出的美感效用，甚至抽象的說，作品本身所呈顯出共同的美學理念，這些都有助於我們理解文學的內在發展；同時，也有助於我們區別類型與類型之間的差異性，進而能夠有更寬廣的視野去體認「文學」這項極抽象的共名所包容的豐富意義（註8）。因而，本文依照詩作的不同主題加以分類，經由對作品探究及分析，挖掘每一類主題之下作者所投射的主觀意識（註9），嘗試確立康熙時期宦遊詩中共同的文學特質。

由於以符號學詮釋文本的研究方法，著重於開啓文化符號內在潛存的意義，筆者在研究中運用符號學的觀點，它有助於瞭解宦遊詩人書寫及編輯臺灣「番民」的文化符形，及符號所蘊存的觀念意識，透過「番民」文化符號本身獨具的象徵意義之闡釋，掌握宦遊詩人如何形構臺灣「番民」文化符號，並於符號形象之中潛藏了何種主觀意識？希望藉此研究視角切入康熙宦遊詩有關臺灣原住民的作品，瞭解其所形構的文化符號以及符號內蘊的價值意義，並由此層層解析的方式，將臺灣原住民文化的原始面貌，與宦遊詩人加諸其上的彩色，相互顯影及對照，釐清治之初來臺官員審視臺灣原住民的文

〔註8〕 蔡英俊，〈抒情精神與抒情傳統〉，收於《抒情的境界》，臺北：聯經出版社，1982年版。

〔註9〕 西方文學批評中「主題」一詞，源自於古希臘詞根「tops」，有共同地方之意，因此，「主題」是意義存放的「空間或位置」，在此空間位置裡，作者可以放置一系列具體的、形異義同的詞項，主題就成為這些詞項的共同義素，並且，作者的主體意識也投射其中。馮壽農，〈漫談法國主題學批評〉，收於氏著《文本·語言·途徑——尋找批評的途徑》，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頁96。

化思惟有何侷限性？有無超越漢人本位的觀點，為臺灣原住民文化找到更客觀的審視立場？此外，藝術人類學一門，探討原始民族藝術起源之特徵的學科，這類的知識可用以論證臺灣「番民」原始文化的深蘊意涵。究竟原始民族的文化符號是否具有獨特的審美意義，若有，其不同的文化符號裡所具有的審美意義為何？而這是否為康熙時期宦臺者察覺？又宦臺者是否完全採用漢人文化價值來審視之？若能在研究時，適當地擷取藝術人類的學科觀點，可更客觀地評價詩作。

筆者在進行詩作之闡釋時，會援引不同理論學科的思考方式來詮釋詩歌作品，為了使本文研究得以延展出理論性的觀點，而不單注譯詩作內容，同時為能加強文學特性能於文中清晰論述，筆者亦嘗試徵引中國詩歌史上的諸多觀念，如詩歌意象論、情與景的交融關係，筆者欲捕捉的是含蘊於詩歌中的特定意象，這些意象可以是古人表達情感所運用的媒介，用以凝聚特定的情思，但亦可成為後人欲傳達感覺、情感、思想的媒介，究竟某些意象在宦遊詩人的筆下是如何被運用？其運用傳達時的是什麼情思？都是筆者擬探討的問題，也筆者思考詮釋的進路。

統合此述，筆者欲藉著相關方面的文學論著，參照本文、研究文本，進而開掘本論題可能存有的研究面向。又為了避免受到理論先行而造成研究上的誤差，筆者在擇取相關論點前，乃先詳讀詩作，初步掌握詩作的書寫題材與取向後，再著手適宜的文學理論及觀點，以達相互輝映之效。

本文以康熙宦臺詩為臺灣古典詩歌發展的考察基點，為顧及作品本身的時代性、社會性，筆者將參照歷史文獻作為佐證，並融合當時的政治歷史背景及文化氛圍，交互論證宦遊詩人的思想，因此，亦採取歷史研究的方法，討論康熙時期政治與臺灣詩歌發展的特點。而筆者也著重歷史背景資料的闡釋，包括「方志」職官志、武備志、藝文志……等官方文獻，並通過傳、紀、疏、文的閱讀，了解當時官員在臺的實際宦政作為，企望透過對當時仕宦者在臺期間的角色扮演、職責範圍、工作內容……等實務層面的掌握，從而了解這些題材如何映現於詩歌作品中。此外，通過《清聖祖實錄》、「康熙宮中檔案」等攸關康熙皇帝對臺灣認知的一手資料，了解清廷對臺態度及治臺重點，以及臺官員如何呼應康熙皇帝的治臺策略，這些都將歷史資料與詩作相互映證。

## 第二節 研究範疇與概念界說

### 一、研究範疇

本文研究論題以康熙時期臺灣宦遊詩為主，內文論述的時間範疇界定於康熙領臺近四十年的期間（1683～1722），並以當時宦遊者來臺灣所寫的詩歌為研究對象。臺灣最早被收納為中國疆域始於康熙朝，當時來到這個初闢之地的官員，皆有其特殊的責任與使命，視察、督守、教化……等工作，主要是為荒服草創的海島，移植建立新的社會根基。

本文之所以「康熙時期」為時間斷限的理由，以臺灣發展史來看，康熙朝可以作為一段獨立的觀察時期。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廷收納臺灣成為中國版圖，此乃中國疆域史上首創之舉，臺灣由原來的化外之地轉變成為版圖之一。康熙統治臺灣除了接收於明鄭所開發的粗略規模外，臺灣社會內部的建構及文化的改變，皆需在統領臺灣之初，一邊摸索認知，一邊開發建設，同時思索如何使臺灣社會成為清廷的延伸地。康熙朝宦遊詩人在臺灣書寫作品時，抱持著摸索與探詢的心理，企望從臺灣的自然、人文環境中尋找合於入詩的題材、或者應寫入詩中的題材，並且組編「八景詩」，將中原文化的「人文空間意象」實踐於臺灣〔註10〕，這當中作者書寫時所斟酌選擇的思惟運作，也反應了康熙朝初步認識臺灣的摸索特徵。

本論文時間斷限於「康熙時期」的另一原因，雖然文學與政治之間非絕對地並馳發展，但在臺灣史上，發生於康熙六十年（1721）的「朱一貴事件」，確實是刺激清廷重視臺灣的一項重要歷史事件，此後朝廷不僅擴增官員權限，設立巡臺御史，康熙轉入雍正時期，朝廷對宦臺官員的身份、任務亦提出不同要求，臺灣行政區域分趨細密，同時官員駐守之地向北移，而這些都一定程度地影響宦遊詩人寫作時的思惟及關注焦點。「朱一貴事件」後，整個朝廷觀看臺灣的視野與康熙朝已有一定程度的差異，原本「一府三縣」的行政劃分，至雍正朝始有彰化、淡水等行政區的增置，隨著臺灣的開發，政治權限空間亦隨之擴充，官員更深入臺灣各地，「八景詩」的書寫，亦更由原來

〔註10〕 蕭百興，《清代臺灣府城空間變遷論述》論及宦遊詩人在臺灣題詠的八景詩「斐亭聽濤」、「安平晚渡」、「沙崑漁火」等勝景意象，即是官員們對臺灣社會實踐人文空間理念的表現。詳見此文第三章、第四節，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1990年版，頁85～86。

的「臺灣府八景」擴展為「縣廳型八景」〔註 11〕。八景詩的景點，在雍正朝以後因行政區域的擴張，地理景觀的不同，使景點內容隨之增添，亦使臺灣的八景組詩發展更趨繁複，如此，不僅中國官員對臺灣的認識更趨精細的反應，亦意味著作者體驗臺灣空間情境的內容也改變了，詩作中所承載的題材內容亦會隨之調整。因此，探討書寫臺灣八景詩最早的作品——康熙時期〈臺灣府八景〉，釐清當中的書寫現象後，可裨益了解後來「八景詩」發展的內緣變化脈絡，包含詩作的題材屬性、內容涵義等，亦可知悉臺灣空間如何被清廷官員論述的衍變過程。

康熙朝除了是奠定臺灣社會基礎的朝代，在臺灣古典詩歌發展史上，康熙朝也是一關鍵點，詩歌書寫社群的變換即是一項特徵。從明鄭時期著重表現民族意識、書寫羈旅窘困〔註 12〕的明朝遺老，到康熙時期已發展出中原與臺灣本土出身的兩個詩歌書寫群，如此的區別，對往後臺灣詩歌的發展，有一定的影響力。但因為仕宦詩人比本土文人更早在臺灣從事文學奠基工作，遂擁有此階段的文學主導地位，於是，這批最初來臺者所寫作的詩歌，理當會影響後來者的書寫模式，特別是前述的「臺灣八景詩」，是最具指標性意義的代表作品。循此想法，筆者認為為了更清楚釐清臺灣古典詩發展的根本特色，需以此階段的詩作作為文學根基的探源焦點，故而以康熙時期為本研究論文的時間範圍。

本文研究的材料界定於臺灣的宦遊詩作，乃欲透過詩作本身來鑽研宦遊詩人的書寫題材有何面向？同時這些思想內容的面向反映出當時宦遊中國詩人對臺灣的認知有何侷限性，同時他們認知侷限形成的留白又如何轉化成為他們發揮文學才思的空間？這些得自詩作分析後的論題面向，筆者視為臺灣詩歌起源發展的原型特徵。

究竟康熙宦遊者詩作題材呈現何面向？本論文研究宦遊詩作的題的範疇，得出仕宦者歷經渡海風險、見聞異地風俗、體味宦情之苦、觀察奇山異水……等的生活體驗，皆為臺灣古典詩歌史上初期的書寫題材。其中，最受注目的奇風異俗之題材，往往因臺灣足以提供仕宦者新奇的生命體驗，這類

〔註 11〕 劉麗卿，《清代臺灣八景與八景詩》，中興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0 年版，頁 14~20。

〔註 12〕 施懿琳，〈明鄭時期寓臺的遺民詩人及其作品〉，《從沈光文到賴和——臺灣古典文學的發展與特色》，高雄：春暉出版社，2000 年版，頁 19~63。